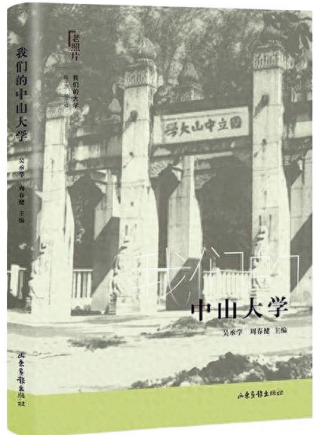


# 脱俗求真是中山大学的精神传统

文/中文系 吴承学



《我们的中山大学》，书名本身就具有宏阔的自由阐释空间。

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到百年中大的历史背景中，其内涵便显得更为浩瀚无涯——百年以来的“我们”，包含了无数禀性各异的师生、校友；百年以来的“中山大学”，更是一部波澜壮阔、沧桑变化的历史。简而言之，这里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我主编过《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等书，这些书介绍了中山大学的学人、学术、学科乃至文化等方面情况，但总有“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感。《我们的中山大学》要用十多万字的篇幅，去表现百年的中山大学，尤见其难。我们只能以小见大，选取特定角度，在特定范围内去反映百年中大。这就像游览者一样：虽然无法穷尽名山大川的全貌，但探访一丘一壑，亦可领略其旖旎风光。读者不妨以书为径，拾级而上，游目骋怀，去感受百年中大的高山流水、云霭亭榭之美。

本书以中山大学的学人为核心，由学人而涉及学科，由他们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校园，观察这所百年名校的风神。

中山大学自创校以来，名流荟萃，大师云集。古人说：“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大师名

家，就像名山大川的“珠”与“玉”，是中山大学的精神所在，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仰望对象。清代大学者阮元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经过百年时光的淘洗，中山大学真正具有重要价值的学人、学术已经接受历史检验，得到认同。古人谈到选录前人的作品时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这是一种审慎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我们编选的内容仅录回忆逝者与远去历史的文章，表达对中大前辈的缅怀与对历史的纪念。

大师名家，是中山大学的名片，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天空上的星斗。中山大学一批大师名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密切相关。比如：邹鲁、许崇清之于高等教育史，傅斯年之于史料学，陈寅恪、岑仲勉之于中国史，梁方仲之于经济史，容庚、商承祚之于古文字学，詹安泰、王起、董每戡之于中国文学史，王力之于古代汉语，朱谦之、杨荣国之于哲学史，马采之于美学史，梁宗岱之于法国文学，戴镗龄之于翻译学，夏书章之于行政学，姜立夫之于数学，陈心陶之于寄生虫学，蒲蛰龙之于生物防治学……

本书选文兼顾史料性与可读性，希望选入一些有真情实感的

随笔性文章。在选取纪念文章时，我们尽量考虑作者与传主的亲近关系。本书所选，有本人的回忆，如许崇清《我的经历》，杨成志《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儿女的回忆，如詹伯慧回忆詹安泰，杨淡以回忆杨荣国等；有学生的回忆，如曾宪通回忆容庚，陈炜湛回忆商承祚，王宾回忆戴镗龄，陈春声回忆蔡鸿生等。各篇文章的先后排列，则以传主年齿为序。

人文传统气息与现代学术结合，开放包容气度与家国情怀兼备，是中山大学建校以来形成的传统。在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大可谓开风气之先：自建校之日起，就揽入一批具有现代大学制度意识和国际性眼光、兼备现代学术视野与传统学术根柢的掌门人和学者。他们致力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在很短时间内便把中山大学建成雄踞国内高校前列且影响深远的学术重镇。建校不久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教育研究所、西南研究会、涵盖文法理农工医各科的中山大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都站在当时中国学术前沿，起到了引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1927 年傅斯年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并成立民俗、考古、语言、历史等四个研究会，还出版了《国立中山大学语



1928 年 12 月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容肇祖、黄仲琴、沈鹏飞、商承祚、顾颉刚、余永梁等合影

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等刊物。基于同样的学术理念，次年傅斯年在此基础上，又在广州筹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组织之一，是中国现代人文学术脉发轫的标志。这些重要学术史实难以备述，但从本书《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史实述论》《容肇祖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文章，可以窥其一斑。

百年中大的发展历程表明，有大师，方可成大学；而中大校园建筑的历史变迁又昭示着，大学建筑同样折射出大学气度。本书《对中山大学校园建筑的文化解读》一文，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百年以来中山大学三个校园建筑的历史演变。这些校园的建筑沿革，就是中大变迁的空间叙事史。其中康乐园的建筑糅合中西建筑之美，极具特色，颇有文明互鉴的象征意义。当然，真正给这些建筑注入灵魂的，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正因为有大师名家在，中山大学的建筑才令人难忘。故而一年四季，总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中大的校园建筑沉淀历史记忆，浓缩人文气息，随着时间推移，其文化遗存的珍贵价值也越发显现。在学子心目中，母校就像母亲，她美丽而博大。我于 1977 年考入中山大学，在康乐园读书、生活将近五十年，每天到办公室都要经过陈寅恪先生故居。沿着先生当年散步的著名小径，从曾经为他遮阳避雨的大樟树下走过，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我每年指导一年级的新生，总会带他们去参观陈寅恪故居，让他们默识墙面挂着的先生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我想，脱俗求真，应该是“我们的中山大学”赓续的精神传统。

回顾中山大学的历史，我们有着深深的感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山大学建校一百年，故人与故事已成历史。我们编选这本书，绝不仅仅为了思古怀旧，而是要“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追慕其品格，以先贤为明灯，让历史照亮未来。

（作者系中文系吴承学教授，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 年 6 月 8 日 A6 广角版）



（上接第 8 版）

《匈奴史稿》就是一部填补研究空白之作。他除尽可能完备地搜集中国文献中有关资料外，在德国留学期间，凡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他都极力搜罗。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入研究，他终于写出近百万字的《匈奴史稿》。匈奴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不立文字，无自己的史籍记载。在其 700 多年可考的历史中，中国文献和西方史籍的记载，各执一端，互不连接。陈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淹博学识，融会贯通，比勘钩沉，构建了一部完整的匈奴历史。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中成果最大、资料最丰富、

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此书 1989 年出版后，备受学术界关注，1992 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尤为可贵的是，陈先生的研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不为政治时尚所左右。他反对学术的功利性和依附性。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是为了求真求实，绝不应视学术为术以取利。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系列著作，当年在香港出版。至于他的这部含有 20 册论著的文化学巨著“文化论丛”，除其中的《文化学概论》于 194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其余的尚未刊出。1945 年他将此部“文化论丛”的手稿寄存于美国的 Honnold Library，显然是为了慎重起见，同时也表明他对书稿

的特别珍重。

陈先生长期担任大学的领导，他在教育学上也有独到的建树。他认为教育旨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主张教育要彻底现代化，无论城市、农村教育，大学、职业教育，都要彻底现代化。他认为文理不能偏废，人文各门学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反对停办或减少文科数量。他还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求知”。“求知的目的未必为了应用，然而要有所应用，则不能不求知。”“大学培养的政治学者、政治家，和制造官僚政客是绝对不同的一回事啊！”他主张大学的设置应当注意区域的特殊性，作出合理的布局，并认为民国时期，大学集中在平、津、沪等数个地

方是不合理的。因此，他反对胡适所提出的指定五所大学为第一等地位的主张。（参见陈序经《大学教育论文集》，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 年 10 月。收入本《全集》第四卷。）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陈先生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关注现实的做法，以及时代的使命感，使其著作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相反，作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时代路标，它们将被代代薪火相传，其价值益加彰显。其著作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规范，将成为后学得窥学术门径、走向学术道路的指针。

（上接第 4 版）

共获得 1 金 1 银等多项佳绩，包括男双冠军、男团亚军、女单第四名等荣誉，以及甲组团体总分第二名。何楷光 / 张亚强组合以 6-2 战胜暨南大学队，夺得男双冠军；由他们带领郑皓天、徐海城、黄知予的男团力克多支劲旅，收获亚军。新生选手郑皓天 / 徐海城组合获男双第五，鲍兴雅成为首位闯入女单四强的大一选手，彰显队伍深厚潜力。

近年来，中山大学通过“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 大众体育普及”的双轨并行模式，校园网球氛围日益浓厚，此次比赛成绩展现了“老将引领、新人辈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将进一步推动校园网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